

数字社会中公共性的机制交叠

——基于三个技术公益项目的考察

罗 婧

摘 要 现代社会中公共性的机制不断完善,从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发展出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并且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进一步出现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人格化机制。从三个技术公益项目的发展过程来看,伴随数字技术的应用,个体与公共的关联走向多元,公共性通过数字空间呈现出机制交叠的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有力保障。这从顶层架构上贯通了公共性的不同机制,与实践中机制交叠的特征相契合。通过进一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可以有效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 数字技术;数字社会;公共性;社会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公益实践;共建共治共享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3-0134-13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SRC011)

伴随数字技术的介入,社会连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本的组织结构被瓦解^[1](P73),新的公共实践形态由此不断涌现,在更广阔的维度上激发公共性。与此同时,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尤为鲜明地体现在各种公益实践中。比如,伴随近年来数字慈善事业的兴起,互联网捐赠平台让陌生人的相互帮助成为可能,在更广泛地激发了公共性的同时,却也遭遇了缺乏社会信任等困境^[2](P59)。再比如,以社群网络平台为内核和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社会企业大量出现,这种跨部门的合作内含了多重价值,各主体之间难以形成对公共性的统一认识^[3](P97)。这些情况都显示,在数字技术日益浸透的社会中,公共性的建设既迎来新机遇,也遭遇新挑战。回溯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公共性这一学术命题之所以长久地吸引着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切,正是因为它所处的悖论性境地:在高度开放、流动和分化的变迁趋势下,社会团结的难度越来越大,但也因此,公共性越来越被每个人所需要^[4](P1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因此,应充分把握数字技术给社会运行带来的变化,剖析公共性内在机制的转向,从而促使活力与秩序两相协调,通过有序、持续地激发公共性,达致社会的团结与凝聚。

一、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性机制的变迁

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公共性的机制也随之变化。在农业时代,人们的互动范围局限于日常生活的领域,人际交往是公共性生成的基础;自工业时代以来,人们的互动逐渐超出地方性的日常生活,公共性的样态、机制日益复杂^[5](P12-13)。一方面,原先社会的组织体系不断被打破,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态十分多样;另一方面,这种多样、纷杂的社会关系,又迫切呼唤着共通的价值与秩序。由此,公共性的议题跃升至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在以往流动率低、同质性强的社会中,

人与人通过日常交往、面对面的交流来处理公共事务,形成一致性的认识。但伴随社会的流动性、异质性增强,公共性的生成、运转则需要制度化的规范作为保障。这种变化是中西方社会共通的。

(一)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性机制的难题

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在流动性激增的社会中如何重构公共性的问题,自李普曼以来,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桑内特、泰勒、弗雷泽等学者持有不同的主张,但本质上都将公共性视为一个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的领域——要么将公共性视为“私人性”的反面,要么将由私人而产生的不平等条件悬置起来,致使私人公共成为对立、界分的两个范围^[6](P31-32)。从而,既有的人际交往形态被当作表达个体利益、释放个人情感等的社会基础,个体与公共之间陷入重重张力。这种公共性的难题极为凸显地反映在互助组织的发展中。

以友谊会为例,其发展正显示了一个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行动拓展为制度所维系的支撑体系的过程。友谊会自18世纪起在西方社会蓬勃生长,为英国乃至欧洲、北美等地的数百万工人、城市贫民提供了保障。一开始,友谊会以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来维系运转,比如通过平时饮酒、派对等活动建立亲密关系,而当有人遇到难处——生病、丧葬、迁徙等各种情况时,其他成员自发捐赠、提供帮助。但伴随着人口流动的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成员面临着跨地域的流动,友谊会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让各地的社团能够联动起来。比如,组织者通过去往各地的分支机构、与当地社团的成员交流,促使其相互之间形成共识,进而建立联盟,让互助得以跨越地域。这样的举动既在人际互动中注入了抽象制度,也在抽象制度中融进了人际互动^[7](P129)。

但在发展中,原本相融的抽象制度和人际互动很快出现了显著的张力。例如,友谊会逐渐引入精算体系,对于个体风险进行计算,来赋予内部成员的互动以公平性,从而保障组织的运转;但是对精算体系的严格执行势必会将高风险成员拒之门外,与先前由人际互动而倡导的仁爱等公共价值相悖^[7](P133, 140-145, 182-196)。这种机制的冲突在西方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正如格罗斯在对美国公共事业的回顾中认为,尽管传统的慈善团体已经转型为现代公益组织,公共性越发诉诸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机制,但是当这些组织对人的关注不足、缺少足够的人际互动来建立共识时,就会导致公共性的失落或遭到质疑——“若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联系,那么最终,公益的现实有效性与道德意义都将失去”^[8](P35)。可见,在西方公共性的叙事中,如何在人际互动所产生的持续性困境和抽象制度带来的公共性分歧之间进行抉择,一直是困扰整个社会的难题。

(二) 中国式现代化中对公共性机制的多维塑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人际出发、由推己及人而扩展开来的机制与实现天下大同理想社会的机制一脉相承。个体与整体、自我与社会的关联是通过相互的帮助和扶持来实现的,从而公共秩序得以被塑造和维系。而近代以来,伴随中西方文化、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碰撞,这种一体关系被打破。一方面,从个体出发的原则被逐渐重视,这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来重构公共生活。很多知识分子、爱国人士自发组建社团,以期通过人际互动重建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但另一方面,类似的社团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其主要通过共同修身来促进成员提高道德修养、塑造“良心”,但“良心”却无法支撑起服务社会的实践,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心”,彼此之间难以形成共识,换言之,即缺乏共同的“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归属^[9](P78)。如何将个人利益的实现蕴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实现之中,成为促使个体与公共关联起来的必要议题。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和国家通过上下一体的制度安排来塑造公共秩序、提供公共福祉。在这样的格局中,以人际交往为基础的社会互助并未消失,也仍然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作用^[10](P114)。可见,两重路径走向合流,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公共性机制和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公共性机制处于同一个场景中。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逐步被纳入各项事业、各个领域的建设中。这使得主体互动的多样性大幅增强,社会力量也具有更多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机会。但同样是在市场机制的作

用下,人口的地域流动大大增加、社会关系日益陌生化和制度化,给公共福祉的提供、普及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在工作、生活等各种场景中,人际的陌生化意味着人际互动变少,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公共性机制随之被削弱,这滋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在“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思路下,党和国家以制度建设动员社会力量逐步、深入地参与公共生活,却也需要经由对社会活力的激发来启动社会的公共性。因此,重建人际关联、促使社会自发地消除矛盾、培育友爱,十分必要。

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历程中可见,公共性弥散在整体的社会生活中,多样的观点、经验既需要制度的引导与塑造,也需要在充分的人际互动中建立共识。因此,必须走出西方叙事中私人与公共的对立,在更普遍、更开放的意义上理解和界定公共性。有学者就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公共性赋予一种关系性的意涵:“两个以上的个人构成主体际或主体间的联系,处于某种共同体之中……在他们之间就具有了某种公共性。”^[11](P82)这一赋义与中国社会基础的关系本位特征构成对应^[12](P41)。

(三) 变迁中公共性的机制类型

由中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可见,公共性蕴藏于不同的机制中,从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机制,发展出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机制。不同的机制之间既有贯通的基础,也有内在的张力。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更是带来了社会连接方式的改变,线上互动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人工智能更是加速了虚拟与现实相互交织、迭代了社会互动的复杂化程度^[13](P25-26)。总结而言,在当前,公共性的机制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类型。

1. 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以人际互动为基础

现实的、具象的人际互动一直是公共性的重要基础。在各种公共行动中,通过人际交往而建立更多的社会关系、拓展社会网络是很多社会成员参与其中的重要动机之一。而要实现这种人际互动,就需要现实人格的参与。现实人格是社会成员基于各自既有的关系网络、情感基础、过去交往经历而形成的自我特征,是每个个体参与生活实践所独有的综合表征。人格会形塑人际互动模式,进而影响自身的参与行为和共同行动的持续性、影响力等。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基于现实人格的人际互动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诸多对于我国社会文化的研究都指出,人情交换、人情面子是中国人关系运作的独特性所在。在密集的人际交往而构造的熟人社会中,“给面子”“争面子”“讲面子”“爱面子”等既具有工具性又具有价值性的心理建构、关系运作支撑着日常生活的运转^[14](P48)。从中可见,基于现实人格的、面对面的、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是中国人开展公共生活的重要依托。已有研究指出,社区的公共秩序、公共活动、公共决策均在人与人围绕“面子”的生成、“面子”的运行中实现了再生产^[15](P63)。社会成员对于自我的认知建构和对于整体价值的塑造追求是通过人与人的具体联结实现的,即自我和整体是通过人格化的渠道产生了公共性关联。伴随人类社会的进程,这样的人格化机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即便在各种应用数字技术的公共生活场景中,人际互动的特质、规律仍然构成了公共交往的基础。例如有研究发现,在移动短视频平台上,生发于日常互动的话语、情感仍然是能否引发认同、促成共识最为关键的因素^[16](P112)。

2. 非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以抽象制度为基础

伴随现代化转型,以理性为根基、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的社会组织方式不断拓展。与此同时,人口在地域间大量流动,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强,以往的熟人社会随之被打破,原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饱含互助情谊的人格化互动难以应对普遍的流动性。在这个过程中,非人格化公共性机制成为人们交往的重要渠道,依赖于理性制度而非感性关系的社会组织以其所具有的弹性和韧性,在公共福利的提供、公共生活的运行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规模^[17](P57)。非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在社会如何整合、如何构建理想的社会关系上指向了一种更为开放的思路,即“共生共在”的思想。共生“在本质上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不同于内部和睦、共存共荣的人格化公共性机制,非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试图在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想法思路之间寻求相互承认的可能或建立彼此必要的边界,即抛开人格化的个体差异性,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每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从而建立一种开放的、

包容的社会结合^[18](P29)。也就是说,公共性越发依赖于抽象化、制度化的非人格化机制。相比以具象的、现实的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以理想的、抽象的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是从整体的交往而非特定主体的交往出发,本身即孕育了一种对公共性的诉求^[19](P129)。基于这种非人格化的关系,社会得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去探寻公共性的生成,即建立人人共享的体系、实现共生共生的目标^[20](P82-83)。可见,如果说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是自我与整体达成调和的一种结果,那么非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则是自我与整体为趋向调和而进行的安排,从而容许更多变动性的因素和更多样的调和方式。

3. 虚拟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以数字空间为基础

伴随数字技术在各个社会场景的深化应用,人际互动的场景不再局限于现实的、具体的、熟悉的社会单元,人的感性认识也不再只是依据经验的、相对清晰明确的^[21](P46-47)。各种数字平台不仅承载了以商品、服务、文化、价值等为内容的个体之间的交互交换行为,也由此成为公共服务的承担者和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在这些平台上,个体得以直接与他人互动产生关联,但必须认识到的是:个体既具有虚拟形象,也具有现实形象;主体之间的关联的形态既可能是虚拟的,也可能是现实的;社会整体既建立于虚拟表达的基础上,也与现实世界存在联系。这使得个人在数字空间中形成了与自身既为一体又在呈现面向上有所不同的虚拟人格。换言之,虚拟人格是个人的现实人格在特定数字空间中的部分投射。一方面,虚拟人格仍然需要现实人格作为支撑,虚拟人格的话语和行为受现实人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于现实空间交往需要人格的完整呈现,虚拟空间给个体提供了一个框定性的主题情境,使个人可以根据时空、兴趣、能力等只投射部分人格在其中与他人进行互动,而不用具身性、全身心地参与。有研究就认为,虚拟人格可能会与现实人格冲突而引发自我认同危机^[22](P84-88)。而随着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虚拟人格不仅逐渐被接受,甚至被认为可以成为民法典的民事主体^[23](P57)。虚拟人格的互动会导向更为复杂的公共性机制,并且,随着智能体、数字分身、数字人在当前越来越常见,人工智能技术基于现实的数据资料生成出拟人化的^[24](P22)、具有参与公共生活能力的数字主体,这也会让数字空间中人格的指涉范围、包含的面向更为复杂。

总结而言,伴随现代化进程,公共性的机制不断丰富,从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发展出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并且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进一步出现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人格化机制。那么,在实践中,这三类机制如何运作,又构成了怎样的关系?本文即围绕三个数字技术的公益实践项目展开剖析。这些公益实践项目突破了现代社会人际相处的原子化倾向,推动个体走向公共,即通过捐赠者、志愿者、受助者、组织者等多元主体的联结,促使个体从自身的情感、利益迈向公共联结,公共性由此从隐性转向显性。因此,基于对公益实践项目的研究,可以鲜明地探察公共性的机制及其变化。加之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具体着力点,公益实践项目的运作过程是党建引领、行政介入、社会参与相交织的结果,显示了中国语境下公共性特色的制度基础,为探索如何应对数字社会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恰切的窗口。

二、案例分析

笔者于2023年接触到由T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的技术公益平台,该平台以“科技向善”为倡导,力图通过数字技术来推动公益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为相关的公益项目提供资金、工具、宣传等方面的支持。该平台目前辐射了335个公益项目,覆盖了教育助学、自然保护、灾害救援、乡村振兴、医疗救助、关怀倡导等六个领域。通过与T公益慈善基金会的沟通,笔者发现,不同的项目在发起时所依托的公共性机制有所差异,即属于以上三种类型中的某一种,因而相应的调查研究就基于这三种公共性机制的划分,选择了三个典型的公益项目展开。这三个公益项目具有差别化的公共性机制:X项目以人际互动为基础,

S项目以非人格化的商品交换制度为基础,而G项目则以虚拟人格为基础^①。基于不同的公共性机制,三者在运转模式上截然不同,但其在后续面对自身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时,却都通过拓展公共性的机制来予以应对,并在多种公共性机制相交叠的态势上迈向趋同。因此,对三个项目具体运行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恰恰是探察三类机制如何运作,以及数字社会中公共性机制将如何发展的窗口。调研主要运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基于前期项目方提供的介绍资料、搜索到的报道资料等素材编制提纲,将三个公益实践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者、支持方、志愿者以及相关受众作为访谈对象,围绕公益实践项目的发起缘由、实践内容、发展过程、发展问题等方面汇集多方信息。

(一) 科技助老的X项目

X项目以“科技助老”为主线,通过组织志愿者去往社区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等各类电子设备,破解老年人所遭遇的数字鸿沟困境。因此,X项目以人际互动为基础来拓展公共性。但当其遭遇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后,组织者也引入了新的实践方式,公共性机制随之拓展。

1. 引发共鸣的爱心: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

X项目最早是由周家斌联合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发起的。周家斌从小是由姥姥照顾,而当他去往外地上学之后,只能通过电话向姥姥进行简单的问候。随着语音留言、网络电话、视频聊天等越来越普遍,高龄的姥姥在接触、学习这些数字化的交流手段时非常吃力,他就利用假期回到家里的时间教姥姥使用电脑和手机。在这段经历的启发下,周家斌意识到大量老年人及其家庭都面临这种“数字鸿沟”的困境,萌生了改变这一现状的想法。于是他动员了想法相同的室友、同学,基于Z发展基金会的支持组成了一个13人的志愿服务团队,在2011年一起去往Y社区教授老年人使用电子产品。一开始,老年人很难理解志愿者讲述的内容,志愿者李铭浙就曾提及:“老年人需要我们解释清楚向右向左指是否意味着返回,以及为什么那个小房子就是主页。所以教授不能仅仅教授如何使用,解决源头问题才是最关键的。”于是,志愿者使用了更为通俗易懂、富含比喻手段的讲解方式,让老年人能够迅速掌握相关技能。这使得X项目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

无论是在发起人推己及人的经历中,还是在以志愿服务为内核的行动模式下,X项目中公共性是人格化的,其生成、运转以人际互动为基础。据X项目组织者张平介绍,志愿者不仅教授老年人电子技能,在日常生活中也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慰藉等各种支持,与社区的老年人构建了紧密的人格化关系。同时,X项目也力图由此影响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互助氛围,正如张平所说:“我们希望将一个理念传达给大家,就是在家时要以志愿者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父母。而且我们在每次活动时,都要向老年人传达一种以点带面的想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后,也能向他们的邻居、亲戚朋友等提供帮助,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名科技助老的志愿者。”通过这种人际互动的传播,志愿者、老年人得以建立越来越多的情感连接,使得所处的社区成为熟人社会,这样大家“才能真正感受到社区原来是自己的家”,才能够构建有序、积极的公共生活。可见,X项目依托于以具象的、现实的人际互动为基础的公共性机制。无论是动员“从我做起”的志愿者,还是鼓励“察己知人”的老年人,其试图让参与其中的现实人格经由诸多的人际互动,将自我对于生命的认识、对于自身未来处境的营造和社会整体的爱老、尊老、适老的价值关联起来,形成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

2. 机制的拓展:应对持续性难题

在发展过程中,X项目遭遇了持续性的难题。虽然X项目每次服务的目标都很明确,即让老年人掌握操作电子产品的相关技能,但具体的服务流程则因人而异。老年人不仅对数字逻辑的理解和学习能力有差异,对于学习电子产品的动力和耐心也不同,有的老人可能需要反复进行教授才能记住相应操作。X项目志愿者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展开教学。但是在以社区志愿服务

^① 基于学术伦理,本文案例涉及的机构、人名、地名等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为载体的活动中,老年人往往有各自的生活节奏,常常以处理家庭事务为先、为主。这些问题无疑都放大了项目的成本,降低了项目的成效和辐射范围,使得项目难以形成可持续性。

所以,如果仅仅倚重线下的人际互动式社区志愿服务,X项目将极大地受到限制。为此,基于实际情况,X项目同时引入了非人格化的和虚拟人格化公共性机制。一方面,X项目将所教授技能进行字典式拆解,将整体教学还原到每一个知识点,制作成教学讲义、PPT、书籍、口袋书和课程包等内容。另一方面,X项目开发了一个数字技术教学的小程序,老年人可以先通过小程序进行逐步学习,将没有理解的地方通过小程序作出标记,由志愿者线上或线下解决。为了增强项目的教学水平,X项目开展了一系列的培训,设立了志愿者星级评定等激励方式,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志愿服务群体。2014年,X项目在B市H区注册为文明志愿者协会。2015年,X项目正式注册为一家民办社会服务机构,步入了正规化发展阶段,分别在2022年获评B市人口老龄化国情实践教育基地,在2023年获评B市科普基地。

在这个过程中,X项目中主体互动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一来,X项目调整了以往完全的人际互动式技能教学,通过逻辑理性进行知识拆解,形成了非人格化的知识点。通过对既有知识点的组合降低教学成本。二来,通过小程序的开发、开展线上直播教学等,X项目基于数字空间向更多老年人提供服务,打破了时空对于现实人格互动的限制。可见,主体的互动不再限于原先具象的、现实的人际交往,X项目的公共性随之拓展出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以及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人格化机制。

(二)解决临期食品的S项目

S项目由S科技公司开展,通过借助小程序将本地餐饮商家和用户连接起来,帮助商家将当天没有及时售出、品质完好的余量食物以低价售出,从而减少浪费、保护环境,助力构建生态友好型社会。在这个过程中,S项目以非人格化的商品交换制度为基础来实现公共价值。与X项目不同,S项目有一套逻辑闭合的自我造血机制,因而不存在持续性的难题,但也正因为引入了商业逻辑,这引发了不同参与者的公共性分歧。为此,S项目也拓展了新的做法来取得不同主体对于公共性的共识。

1. 完善的造血机制: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

与X项目相同,S项目的创始人同样是基于来自家庭的感受和经历而萌生的想法。许宇昊是一个在互联网企业工作多年的“老互联网人”,2010年起他开始围绕本地生活进行互联网创业。善于从生活发现、寻找创业机会的他注意到,晚上十点从公司出来时,楼下的商铺总是在倾倒食物。他本以为这些只是残羹冷炙,结果却发现商家丢弃的是包装完好、完全未被食用的食品,向店员询问后得知,为保障食品安全,商家规定“卖不掉就得扔”。再加上,他4岁的女儿偶尔看到家里倒掉剩饭剩菜时总是非常难过,认为食物是有生命的,不应这样被抛弃。在这些触动下,许宇昊产生了以减少食物浪费为目标的创业想法。实际上,2015年时,丹麦已经出现了首个解决食物浪费的应用程序“Too Good To Go”,其一方面通过搜集各餐厅、杂货店等在关门15分钟前剩余食品的信息,便于用户前往这些店铺低价购买临期食品;另一方面则推出“魔法袋”,绿色食品商、面包店等以固定的价格将临期食品放入盲盒进行销售。这些做法一经推出就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支持,迅速推广开来。参照在这一模式,许宇昊依托于自己在2019年创办的S科技公司,在2021年推出了S项目,主要运用“魔法袋”的形式将本地商户和消费者连接起来,一方面帮助商户将临期食品销售出去,降低成本、减少浪费,另一方面则帮助用户低价买到食品,参与节约食物的行动。

S项目首先号召烘焙类商家加入其中,得到了十分积极的响应。在这样的势头下,S项目将品类逐步扩展到了咖啡厅、快餐店、鲜花店等。访谈中,组织者陆亦珊向我们介绍道,S项目有一套完整的造血机制:“对于消费者用户而言,‘魔法袋’本身是能调动积极性的。因为盲盒通常都有着比较大的优惠,比如花1个面包的钱,一下子能买到四五个面包,这样来看折扣是很大的。而且消费者又能同时达成减少食物浪费(的目标),收获很大的情绪价值。”所以,在S项目的小程序上,“魔法袋”总是供不应求,尤其是很多知名商家的“魔法袋”,消费者用户需要在发布的第一时间去抢购。2023年,S项目已经覆盖了40个

城市,合作门店超过了5000家,并且获得了B市社会企业认证资质。

S项目以商品交换这一非人格化的抽象机制为内核。在S项目的平台上,平台运行者、商家、消费者两两之间并不以线下的、具象的人际互动作为实践基础。个体对于自我认知的塑造和对于整体价值的追求在关联上主要是通过其自身在制度框架下的行动而实现,而不是在人际互动中实现。具体而言,S项目通过信息的提供,将商户和消费者对接起来,从而以增加销售来减少浪费,以自发性的购买和销售达成社会共同的目标。平台、商家、消费者都遵循了自主交换的原则,通过相应的标准化流程和制度层面的协商进行购买确认,进而共同实现减少食物浪费这一公共价值。消费者基于各自的账号在平台上购买“魔法袋”后,直接按照指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去线下自提,商家则提前将“魔法袋”准备妥当,二者之间并不会进行深度交流,对于彼此共同促进的“减少浪费”“保护环境”等公益价值也很难基于现实互动来建立共鸣、相互强化。

2. 机制的拓展:应对公共性的分歧

虽然S项目基于非人格化的交换制度实现了本身的可持续性,但项目中各方主体基于各自人格对制度的理解不同,对于公共性理解就产生了分歧。一部分团队成员以“社会企业”自居,认为项目的内核是商业性的,本质上是为商家用户和消费者用户搭建一个交换的平台。参与者卢希就是出于对生态友好型经济的关注,才投身于S项目。在她眼中,自己是一个创业者而不是公益人。另外一部分团队成员则认为,项目本质上是一个“多方公益的事情”,“魔法袋”的商业形式、发生的交换行为只是为项目添加了趣味性。项目组织者罗娜指出:“虽然现在与我们类似的平台不断出现,但我们没有去使用发券啊、打折啊这些手段,就是没有搞那种互联网的早期玩法。实际上,我们的运转还是一个公益机构的运转。”这种商业角色和公共角色的混乱和分歧,也传递到了其所对接的社会主体那里。比如,有很多消费者用户都向S项目平台反馈,一些商家提供的并非临期食品,而是新生产的食品,即将减少食物浪费所带来的社会关注转变成了薄利多销的商业手段。这既与消费者消费的初衷不符,也破坏了S项目本身的理念。

可见,基于非人格化的机制,虽然S项目能够迅速扩大自身规模,其关于公共性的认识却难以形成一致。虽然S项目的商品交换机制一开始就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的,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可进行互动交流的数字空间。即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只将该程序看作一个流程化的工具,而非交流的平台。从而,各方没有情感认同、价值认同的人格化交往基础,也未能围绕价值进行有效的人际交流,那么各方对于其内在公共性的质疑也就无法避免。

面对这种情况,S项目采取的措施即拓展数字空间,引入人格化的交流机制。一方面,面对团队成员内部关于项目商业性和公益性理解的冲突,罗娜提出了一个“区分而并行”的思路:“S项目的公益性一来是通过自身的平台去宣传减少食物浪费的理念,二来是将自身盈利的一部分投入外部或内部的专项公益基金,去教育、环保等新领域开展项目。”让团队成员以各自人格所生发的理念,来参与相应的工作。另一方面,S项目分别为消费者用户和商家用户建立了对应的数字社群,以此来联通线上和线下的社群,促进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和用户在数字空间中的互动,从而更有效地传递项目的价值。参加社群的消费者通常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因而由线上社群所营造的数字空间可以有效地为其建立环保方面的人格化交流渠道。例如在社群中分享自己的购买经历和环保理念,监督商家的商业化行为,以及相约进行线下的环保公益活动等,进而更好地实现项目的公益性;商家用户则通过分享每日的临期食品剩余情况,细致了解区域内的消费者规模、偏好等,既可以更好地进行成本管理,减少食品临期和浪费的可能,同时也能同其他商家互动形成“魔法袋”的搭配,使“魔法袋”内容更丰富。可见,S项目为了解决非人格化公共性机制的问题,通过拓展原有小程序功能,使团队成员和用户得以在数字空间中拓展出虚拟人格化机制,并进一步延伸到现实中的人格化交流。

(三) 辅助观鸟的G项目

G项目是在T公益慈善基金会、N地理杂志社、S基金会合力推动下开展的。该项目基于观鸟小程

序、手机 APP 的开发,为观鸟爱好者提供了线上交流、互动的数字空间,让零散的、碎片化的观鸟活动通过虚拟人格的分享,转化为规模性的知识积累、聚集化的公众兴趣,更进一步地传递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而伴随项目的推进,G项目在公共性的拓展中,也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尝试。

1. 爱好者的网络聚集: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人格化机制

起先,G项目主要是一个面向普通爱好者的鸟类识别和科普小程序。小程序基于最新版的《中国鸟类观察手册》,收录了近1500种中国有记录的鸟类。用户打开小程序中的“发现”界面,就可以探索位置附近的鸟类,识别、了解在自身场景中所看到的鸟类,并且上传相关的照片、音频、时间、地点等信息向其他用户分享,引发大家围绕此进行讨论和分享感受,并记录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基础。如此,通过促进公众“观鸟、识鸟、集鸟”,G项目力图在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发挥作用。据G项目的负责人顾磊介绍,中国现在观鸟爱好者有十多万,其中不乏专业性强、资深的爱好者,这对于生态保护事业,乃至于鸟类的科学研究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由于整个生态环境的变化较大,鸟类的迁徙等各类活动亦随之改变,比如“南鸟北飞”等现象,这需要通过公众的观鸟行动来进行及时的记录和反馈,从而丰富相关的数据记录,甚至促使知识体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因此,开发相应的记录程序,以及面向公众、面向观鸟爱好者社群的技术平台就十分重要。G项目正是立足于此。在具体的运营中,除了负责提供资金的基金会、通过宣传拓展影响力的杂志社、提供技术支持的机构外,各地的鸟类协会等爱好者社会团体、学术机构也参与到G项目中,从而通过联合的行动促使项目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基于一定的专业性来促进共识的生成。

基于小程序和应用程序,G项目为喜爱“观鸟”的人群构建了数字空间,促使他们开展虚拟人格化的交流、互动,逐步催生出相应的爱好者社群。与具象的、现实的人际交往不同,数字空间中个体的交往并非基于整全的人格,而是经由话题、兴趣、个体的自身考虑等所约化的人格,因而数字化的虚拟人格是局部的、特定的。一方面,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格相仿,爱好者在平台上与其他用户交流观鸟的知识、感受,同样具有情感性、观念性等交往的特征,因此这种交往具有人际互动的特点;另一方面,与现实生活不同,爱好者的形象和交流内容是数字化处理后的,用户的交流在场景、方式上均与线下的互动存在差别,而这也给G项目的发展带来了问题。

2. 机制的拓展:应对受限的公共性

G项目在开发小程序时遇到的主要困难在于,观鸟爱好者对该数字空间的目的和预期实际上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观鸟经历不同、知识上存在差距、观鸟目的和动机也很多元。换言之,不同参与者在该数字空间中所构建的虚拟人格因其各自现实人格的不同而有差异。这就会在现实互动中引发一系列分歧,例如一些普通爱好者随手拍摄记录的鸟类照片、音频,在一些专业爱好者看来不具有记录意义,且会拉低平台内容的质量;一些专业爱好者为了获取高质量的照片或音频,往往需要付出较高的拍摄成本和时间成本,而普通爱好者不能理解这背后的付出,这导致专业爱好者的积极性容易受挫。还有一些用户以工具化的需求使用该小程序,即只是用来做日常鸟类识别,而不参与分享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程序的公益互助性。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使得一款程序或平台很难兼顾多重功能的实现,也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这使得,项目纳入的目标群体被局限,公共性同样受限。

围绕这个难点,G项目将原先小程序的受众定位为普通爱好者,而新开发了一个面向专业爱好者的应用程序。顾磊回溯了G项目在面对这一情况时的决策场景:“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把用户区分为浅度用户、中度用户和深度用户。一开始的小程序我们可能针对更浅层的那部分用户,观鸟更多是出于兴趣。通过小程序,我们可以进行‘拉新’,逐渐吸引人参加到观鸟中来。这实际上也是参照了互联网的漏斗模型。”这款应用程序的使用门槛较高,用户须具有一定鉴别能力,大多为拥有多年观鸟经历的专业爱好者。但是,这样的做法看似是为普通爱好者和专业爱好者提供了实现各自需求的渠道,但也让两个群体在各自的平台上形成了不同的话语、视界。缺乏专业爱好者指导的普通爱好者社区,内容分享可能越

来越随意,甚至会偏离鸟类这一主题。并且,由于缺乏专业爱好者的甄别,普通爱好者社区里的假照片、假信息就很容易带来误导。为了维护社区发展,G项目就需要设置更多的方式进行内容鉴别。专业爱好者社区则形成了专业化的交流门槛,其讨论内容可能越来越远离社会生活。这也导致一些想成为专业爱好者的观鸟新人,在普通爱好者社区进步困难,在专业爱好者社区则难以插话。如此,本具有共同爱好的公众就被拆分成了具有异质性的零散社群。这种公共性的边界不利于认识、文化的共享,会抑制不同的社群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联结,项目所能发挥的公共作用、取得的公共成效就会受到限制。

综上可知,在数字空间中,主体间并不一定具有明确的制度化约定和规范。参与者的虚拟人格是基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鸟类的情感和经历而生成的,而来自生活其他方面的情感、经历则缺少呈现的机会。因此,数字空间中主体交往的维度是受限的。当客观上的经历、能力差异无法通过主观上的情感认同来弥补,社区就会变成“外行”和“精英”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会导致G项目的公共性受限。为了应对这一境况,G项目开始着力为更多样的主体互动形态创造条件。一方面,引入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举办具象的、现实的交流活动,比如,在节假日开展线下宣传活动、共同观鸟活动、公益培训活动等来促进爱好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即引入专业爱好者与普通爱好者的整全人格,促使他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分享彼此的经历,例如出于怎样的机缘跨入观鸟者的行列、如何成为专业的观鸟者、如何科学地观鸟等,进而提升线上社区的内部共识和内容质量。另一方面,从促进整合的角度引入非人格化的制度内容,比如,通过在小程序上设置制度化的激励措施,鼓励专业爱好者为普通爱好者提供鉴别和指导,促进用户以规范的方式分享观鸟数据。

三、机制的交叠: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三个项目在各自的发展中都遭遇了一定的困难,而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主体及其互动形态日益多样,公共性的机制也随之拓展。

X项目所遇到的难题集中在可持续性上。一开始,其以人格化交往作为公共性的生成机制,依托具象的、现实的人际互动来开展活动。这种公共性机制往往具有一个明确的需求目标,会面向每一个公益活动的参与者或服务对象,即其会充分考虑个体在实现该需求中的特殊性,并相应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内容。这种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可以使各方在相互的交往、沟通中展开发自内心的真挚交流,进而高度认同项目的公共价值。这些因素都使得X项目在志愿者和社区老年人的交流中,在与志愿者的相处中,在社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能够通过人际交往的反馈和人际关系的延展促进公共性不断生成。但是人格化公共性机制的问题在于,为了让现实的人际互动注入情感,就不能只关注现实需求目标,而是需要关注对方人格的整体。作为整体的人格参与项目的模式是不同的,那么相应的服务流程也就不明确,需要因人而异予以应对。因此,X项目所遇到的可持续发展难题,就是因为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成本高,进一步说即是,要在应对每一个对象在服务内容和需求方面之外的人格层面,即服务过程中出现了人格冗余的情况。具体来说,X项目的服务内容在于老年人“电子产品教学”,但其不只是面对老年人具有电子产品使用需求的人格层面,而是要面对每个老年人在各自生活中的整体人格——作为家庭照护者的人格层面、具有社交需求的人格层面等。X项目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即是,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小程序,结合制度化的知识内容分解,降低时空、情境等额外现实因素所带来的人格冗余,将与现实需要有关的部分人格通过数字技术分离出来,从而降低现实成本,提升项目的可持续性。

S项目面临的问题在于对公共性的定位上。其以理想的、抽象的制度为基础,设计了非人格化的公共价值实现方式:忽略各方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出发的人格化内容,只通过设置每个主体实现利益和价值的制度化规范途径促使公共性生成。项目以保障制度化途径运行作为明确的需求,并以小程序为工具制定了明确的服务过程。服务对象的参与形式也都因数字程序的形式逻辑设定而统一。但也正因此,从参与主体的视角来看,在公共利益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各方都只是自己与数字技术的交互,并

没有“他者”的人格存在,社区乃至社会是整体性、抽象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各方的参与只限于购买、销售或维护平台的某个单一环节,每个主体对于公共价值的实践并不是基于人格化机制,而是有赖于自身的构建,这种构建停留在主体内部且具有流动性,主体之间看不到其他人的具体人格,即出现了人格缺位的情况。从而,无论是运营者还是用户都无法及时反馈交流和达成服务共识,就会对项目是否具有公共性产生争议。因此,S项目在后期引入微信群、建立商家联盟等做法,就是通过数字社群连接现实的人际互动,将与现实过程有关的部分人格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在场化,从而增加必要人格,促进主体之间分享认识、形成共识,解决由公共性引发的争议。

G项目的发展难题在于公共性的受限。在数字空间中,小程序、手机APP的用户经由网络身份所构建的虚拟人格而建立交往,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社群。一方面,在G项目的数字空间中,用户在线上的表达、行动是在特定的主题下,即“观鸟”的具体感受和经历,所展露的人格形态来自其在线下日常生活中的人格形态且具有一定差异。在这种只有特定主题而没有明确目标的公共性活动中,各方的需求无法通过其虚拟人格达成明确的统一,其中既有只是为了分享知识的用户,也有主要目的是学习知识的用户,同时也存在只将该数字平台作为日常工具的用户,从而各方在参与该数字空间时的行为模式也就不统一。尤其是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社群内主体间的认识会相互强化,其会将个性的经验当作“真实”,与其他社群产生隔阂,从而强化公共性的边界。虽然各方有相关的虚拟人格投射在该数字空间中,但这种投射也只是一围绕特定主题基于自我生活的主观建构,脱离了对其他主体的现实理解,因而并未形成真正的人格参与,即只是一种人格虚置。G项目之前所采取的针对用户开发不同软件的做法,只能强化这种不同维度内部有边界的自我建构,进一步造成社群间在特定维度上的互斥性,并未真正解决在理解其他群体时的人格虚置问题,从而引发了公共性的受限。为此,G项目在之后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则是促进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虚实相宜”^[25](P115),将与想象需求部分有关的虚拟人格现实化。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组织线下观鸟活动引入现实中的人际互动,即让特定主题的虚拟人格同更大的现实生活环境连接和落地;另一方面则是在制度的引导下塑造观鸟行为的一致性,从而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目标和需求差异,突破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

比较来看,三个项目在应对自身问题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促使参与者的人格互动具有了更多重的形态,也让各自公共性的机制走向趋同(如表1)。所谓的趋同指的是一种“交叠”的状态,即以具象的、现实的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和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人格机制兼而有之,相互间有融合也有区分。

对这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折射出数字社会中公共生活所面临的复杂局面。由于主体互动形态的不

表1 三个项目在发展中的比较

公益项目比较条目	科技助老的X项目	解决临期食品的S项目	辅助观鸟的G项目
机制类型	人格化公共性机制	非人格化公共性机制	虚拟人格化公共性机制
主要基础	以人际互动为基础	以抽象制度为基础	以数字空间为基础
侧重主体	特殊的个体	规范的制度	特定的主题
现实需求	明确	明确	不明确
服务流程	不明确	明确	明确
参与模式	不统一	统一	不统一
发展问题	人格冗余,服务成本高	人格缺位,价值共识差	人格虚置,相互理解低
解决办法	减少额外人格,降低现实成本,以数字技术筛选与现实需要有关的部分人格	增加必要人格,增进共识认同,以数字技术显化与现实过程有关的部分人格	落地参与人格,平衡目标差异,将与想象需求部分有关的虚拟人格现实化
机制拓展	三种并行,提取与公共服务需要有关的人格,形成现实理解,达成制度共识,走向机制交叠		

断丰富,公共性的机制随之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替代性的,而是拓展性的,因而呈现出“机制交叠”的特征。这一特征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发展变迁不是片段化的,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连续的系统。在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特征、关系结构根植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中,构成了具有特色的社会基础。

总结而言,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主体互动的形态日益复杂,个体与公共的关联越发多元,公共性的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人格化的机制获得了愈益丰富的连接方式和表达渠道。数字技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需要通过人际互动来实现的公共决策、公共事务等已然向数字空间迁移。其次,非人格化机制得以在更广泛的层面、更多的境况中发挥影响。计算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手段与社会场景的结合,本质上都是经由数据处理将社会纳入抽象性的框架中^[26](P8-9),这与从社会规范提炼出的抽象制度具有相合性。例如,在相当一部分的数字化公共平台中,同意遵守相应的制度是社会成员进入其中的前置因素。再次,虚拟人格化的公共性机制生长出来。原本具身的人格面向能够拆分开来,在不同的方式、渠道中纾解。最后,数字技术的多维度、全场景特征也带来了虚实结合、虚实共生的可能,这进一步打破了公共性机制的界限,为破解人格化机制与非人格化机制之间的张力提供了方法和路径。社会成员为了应对数字空间的高速流动和多元维度,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构建可持续的公共秩序,既要诉诸日常化人际互动来交流价值,也必须塑造制度关系来凝聚共识,还通过开拓数字空间来建立广泛、充分、紧密的连接。可见,如果施以恰当的引导,数字技术基于对公共性机制的拓展能够提升公共生活的连续性、有序化。

四、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27](P65)这种“并联式”发展的实践过程,所积累的经验正指向了如何应对不同公共性机制如何共存的发展性问题。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公共性的生成既要依靠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机制,也要依靠以理想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机制。前者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相贯通,虽然只停留在了道德实践的层面,未生成出非人格化的抽象制度安排,但留下了自我与社会实现天下大同式关联的窗口;后者则以构建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公共福祉的制度安排为出发点,保障人人参与到共同理想的实践中,并共同享有实践成果。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构建的。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公共生活有序开展的基础,也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有机统一的必经之路。这也为中国应对数字技术给公共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奠定了社会基础。最初以人格化机制运行的X项目借助数字技术的虚拟人格兼容了制度化的教学,进而迈过了可持续性的难题。而一开始就使用着数字技术的S项目和G项目在面临公共性的难题时,也是通过建立人格化的互动机制来予以应对。在中国社会,面对数字技术的扎根,公共性的机制并未走向对立,反而实现了相互交叠。而且从案例来看,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人格化公共性机制与以抽象制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公共性机制,在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虚拟人格化公共性机制的连接下形成了合流。

机制的交叠特征显示了数字技术给公共生活带来的机遇,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不同的机制形成互补,增强了公共性的弹性。数字空间中可以共存的多元虚拟人格打破了现实原本具有整体性的人格,减弱了现实个体在应对抽象制度时的精力成本,也削弱了现实生活自在性和既成性本身对于个人在抽象制度前的限制^[28](P1)。非人格化机制所面临的人格缺位则可以通过另外两种机制来填补必要人格,促进主体间共识的建立。同样,虚拟人格化并不是万能的,不同事务、不同领

域之间的相互协调少不了跨事务、跨领域的“摆平”变通做法,而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全面、深度的交往作为基础。

其二,机制交叠为多元共识的生成提供了空间,有利于回应复合的公共价值。特定的机制往往倾向于依托单一的共识逻辑,例如人格化机制通过相近、熟悉的关系来建立共识,非人格化机制的共识体现于共同认可的原则中,虚拟人格化机制则以具体议题的共享价值而形成共识。而在数字社会中,经由机制交叠,多元逻辑得以并存,个体的自我认知与其面向整体的价值追求可以诉诸多元的通路,有利于实现公共生活场所承载的复合性价值:既要维系行动的持续性,也要保障行动的公共性;既要促进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凝聚,也要保障更大范围的社会团结。

其三,机制交叠可以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更多样的工具。正如案例所显示的,尽管围绕各自不同的目的,公益实践项目在初始依托单一的机制来激发、塑造公共性,但伴随项目的推进,当实践遇到困难时,组织者可以能动地选择其他机制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数字空间为不同人格提供了释放面向,也在新的维度上为社会韧性的生长提供了基础,为公共性的萌发提供了新窗口。如此,公共事务的治理在效能、认可度上的提升具有了更广阔的可能性。

当然,不同机制本身具有一定的张力,若难以调和,则可能引发公共性的失衡与异化。在当前,个体需要游走于不同的机制中,也因此具有不断变化的、各异的角色和身份。非人格化机制所塑造的均值化形象、虚拟人格化机制塑造的数字身份可能与个体的现实境况相差甚远,这会导致个体在公共参与中出现言行不一、线上与线下的表达相割裂等现象。并且,在不同机制间的切换也会带来个体的认知超载,进而使个体选择表演性的公共参与方式来应对机制之间的差异,而这也侵蚀公共生活的道德基础,使得所构建的共识是虚假的。再者,数字空间的无穷维度特征使得公共生活有着零散化的风险:不同的事务被拆分成大大小小的专项领域,各自寻求专业化的解决途径,依据特定的情况而达成相应的制度规范;而原本一体的人格也被不同的平台所拆分,主体依据不同的需求、情感等展示自我,构造出不同的、片段性的社会理想。这种单维度的、被约化的线上交往难以为这种跨事务、跨领域的协调提供支撑。尤其是当前人工智能在社会场景中深度卷入,也会加剧这一风险。

由此可见,促使机制交叠导向公共性的整合,让多元的逻辑能够彼此相容、所形成的共识是实在且坚韧的,是数字社会中开展公共生活的关键问题。一方面,元规则的构建是关键,即在容许不同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整个社会应当共同探求具有超越性、根本性的规则,以克服当前公共性的部落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应当回到“人”的层面,激发公共性的主体能力,提供适配“机制交叠”特征的场景,从而促使个体在不同机制之间、在不同空间中实现认知上的整合,进而凝聚具有一致性的整体价值。当然,如何以具体实践予以实现,尚须结合更丰富的资料来展开探讨。

参考文献

- [1] 王天天. 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12).
- [2] 刘振杰, 刘家琪. 慈善捐赠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应对策略. 行政管理改革, 2025, (5).
- [3] 罗婧. 转型视角下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 学习与实践, 2019, (8).
- [4] 冯仕政. 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 从连结到团结. 社会学研究, 2021, (1).
- [5] 李友梅. 数字时代多社会形态叠加与新公共性的再思索. 社会学研究, 2025, (5).
- [6] 袁祖社, 韩贵昌. 基于平等与自由共在的公共性话语范式重构. 理论探索, 2025, (5).
- [7] Penelope Ismay. *Trust Among Strangers: Friendly Societies in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8] 罗伯特·A. 格罗斯. 美国的捐赠: 从慈善团体到公益事业//劳伦斯·J. 弗里德曼, 马克·D. 麦加维. 美国历史上的慈善组织、公益事业和公民性. 徐家良、卢永彬等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 [9] 邓军. 从“良心”到“主义”: 恽代英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团组织困境. 中共党史研究, 2016, (4).

- [10] 张静. 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和社会参与. 开放时代, 2003, (2).
- [11] 郭湛. 公共性哲学: 人的共同体的发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12] 周飞舟. 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社会学研究, 2018, (1).
- [13] 王天夫. 数智时代的社会合作. 探索与争鸣, 2025, (3).
- [14] 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 社会学研究, 2004, (5).
- [15] 杜鹏. “面子”: 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探究.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
- [16] 刘蕾, 史钰莹, 马亮. “公益”与“共意”: 依托移动短视频平台的公益动员策略研究——以“快手行动”为例. 电子政务, 2021, (3).
- [17] 詹姆斯·弗农. 远方的陌生人: 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张祝馨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8] 袁祖社. “多元共生”理念统合下的“互利共赢”与“价值共享”——现代“公共哲学”的基本人文理念与实践目标诉求. 天津社会科学, 2004, (5).
- [19] 任平. 交往实践的哲学——全球化语境中的哲学视域.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20] 袁祖社. “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 (1).
- [21] 闫泽华, 王天夫. 社会连接与智慧城市建设——基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 探索与争鸣, 2022, (11).
- [22] 李辉. 网络虚拟交往中的自我认同危机. 社会科学, 2004, (6).
- [23] 李佳伦. 网络虚拟人格对民法典中民事主体制度的突破. 法学论坛, 2017, (5).
- [24] 吴映平.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失控与技术拟人化伦理秩序的重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
- [25] 何明升. 中国网络治理的定位及现实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7).
- [26] 向静林, 艾云. 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11).
-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 [28] 杨国荣. 日常生活的本体论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2).

On the Overlapping Publicity Mechanisms in Digital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ree Tech-for-public-welfare Programs

Luo 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mechanisms of publicity in modern society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evolving from a personalized mechanism based 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o an impersonal mechanism grounded in abstract institutions, then to a virtual-personalized mechanism based on digital space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tech-for-public-welfare program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mad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public diversified and mechanisms of publicity overlapping through digital space. In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provide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eople to play their principal role, which integrates the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publicity at the top-level design,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lapping mechanisms emerged in practice. Further improving thi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technology.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society; publicity; social govern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ublic welfare practices;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 作者简介 罗 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6。

■ 责任编辑 李 媛